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4 年度)

项 目 类 别	一般课题
立 项 编 号	BZ24YB086
学 科 分 类	党史
课 题 名 称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探究
项 目 负 责 人	张华琴
项 目 参 与 人	张柏林 朱以文 喻泽生
负责人所在单位	巴中市巴州区史志研究中心
联 系 电 话	18728767493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探究

摘要：川陕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在严酷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建立财政机构，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制定实施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财政政策，有力地推进根据地的财政建设。没收与征发、税收管理等财政措施支持了革命斗争，打击了剥削阶层，团结了广大贫雇农。有效的财政建设在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的同时，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与发展。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建立和发展；特点和成效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川北陕南这片土地，建立了以巴中为中心区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为改变过去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满足军事战争的物资需求以及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严格制定执行了一系列严密完整的财政政策，切实解决了军需物资匮乏、农村建设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等问题，极大地巩固了川陕苏区的革命成果。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的经济社会状况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力量阻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陷入了军阀割

据混战的四分五裂局面，人民深受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当时的川北陕南地区，各派军阀势力和封建地主趁机盘剥压榨、相互混战、兼并土地，把地区经济社会搞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

（一）军阀压榨对经济的破坏

四川各军阀为了扩大防区，长期混战。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到1934年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平均每月两次”^①。长期不断的军阀混战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四川所仅有的一些轻工业（丝与火柴），集中在三大城市（重庆、嘉定、南充）的工厂十分之八没有进行工作，自井的盐业缩小了十分之九的生产，川南的白糖业与地方的织布业一样在衰败恐慌之中，一般手工业也是毫无例外的破产”^②。

巴中作为军阀盘踞争夺的重要区域，盘剥压榨尤为明显。期间，驻守巴中的大小军阀余痴虎、潘文华、田颂尧等人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勾结地方官吏、土豪恶霸自委官吏、自定法律，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私造钱币，强抓壮丁，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他们一是吞占积谷，强抢民女。仅两年时间，他们就将巴中县专供修筑县城公共建筑的监仓存谷2275.6石卖掉1732.6石，将用于备荒赈济和修桥铺路的义田积谷3900余石全部卖完。郑启和还强征全县能工巧匠，在县城建起九云高楼，强抢民女作妾，纵酒淫乐。二是滥征捐税，广种鸦片。各路军阀除在巴中征收巨额粮税外，还有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附加税。郑启和盘踞巴中后，占尽良田好土广种鸦片，鸦片种植面积约占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三是私造钱币，金融投机。反动军阀为赚取巨额财富，在自己的防区内私铸银币，强制发行。**1925**年，田颂尧在巴中东岳庙首次开办银元厂，安置亲信刘寿川任厂长。这些钱币粗制滥造，其它地方难以流通，如需要兑换成可以流通的铜币、银币，则需折价兑换。私造钱币，不仅严重影响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而且成为军阀盘剥的一种金融手段。四是强抓壮丁，借机勒索。军阀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经常强迫贫苦农民入伍补充兵源。按照当时的规定，百姓不分贫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抽。但实际上富豪家庭的壮年男子不当兵，贫苦百姓即使独生子也被强征。

黑暗的军阀统治，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百姓苦不堪言。这严重消磨了地区的发展潜力，破坏了社会平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地主盘剥对经济的破坏

在军阀疯狂掠夺、压榨的同时，封建地主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地租的形式残酷剥削农民。“**1922**年，四川省农民人均土地一亩零四厘，陕西省农民人平三亩八分。占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而占人口**9%~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4%~80%**的土地”^①。

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需要上交半数以上的收成作为地租。当时巴中的地租有“分成地租”“固定地租”两种，分成地租一般为五五、四六、三七、二八分成，地主富农占据收成的大部分。

“固定地租”也叫“铁板租”，即佃户地租缴纳量不受收成好坏影响，严格按照地租规定缴纳。若遇严重灾荒之年，粮食颗粒无收，

^①四川博物馆主编：《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佃户也得用家中物什作为抵押物。为防止后期地租过高难以负担，佃农租田时需向地主预缴“压佃钱”，预缴得多，所交地租比例就低一点。为避免地主随意增加地租，农民不得不在重要节日向地主送礼求情，同时无偿为地主干活服役。

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到高利贷盘剥。当农民无力缴纳繁重的捐税，或遇自然灾害，只得向地主借高利贷。高利贷分两种：一是“借粮”，二是“借钱”。“借粮”利率一般是三成至五成，春夏借秋收时还。“借钱”分为三种，分别是：场息、月息、年息，利率一般是一成至五成。高利贷中最高的一种是又名“解斗利”的场息，以一场（三天）为界限，借十元，一场后翻一番。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火坑，往往倾家荡产。

地主剥削阶级加在农民头上的地租、高利贷，军阀官更加在农民头上的繁重捐税，再加上土匪猖獗，贫苦农民往往被逼得走投无路。“三月杂粮三月荒，三月野菜三月糠，年年没有过年米，大人娃儿泪汪汪”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建立和发展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连年不休的军阀混战，豪绅、地主的盘剥压榨，土匪盗贼的肆虐抢劫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社会蒙在赋税徭役的阴翳之下，尽显萧条破败，一片积贫积弱。红军在川北要立足扎根，巩固发展根据地，必须解决苏区人民群众和红军官兵的军需民用问题。川陕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为保障战争供给、恢复经济活力和满足人民需求，采取多种措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

1933年，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一套具有明确组织架构的财政体系初现雏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主席，由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兼任；主席以下设立注册科、经济建设科、工农银行、工农税务局、会计保管科、审计委员科、森林秘书科、秘书长等多个部门，紧密联系，协同办公；各县、区苏维埃设“县财政经济委员、区财政经济委员”，乡、村设“乡财经委员、村财经委员”，负责地方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和实施。经由各级经济委员会领导，财政工作正式步入构建正规化财政体系的轨道。

（一）财政收入

苏维埃政府为保障红军供养和苏区经济的有效运作，筹集动员社会各界，采用经济手段，取得财政收入，为革命战争胜利打好物质基础。川陕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没收与征发，二是税收，三是生产与经营。

1. 没收与征发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由于前期经济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工农商业生产凋零破败，苏维埃政府高额的财政支出难以维持。为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的反革命力量，就只有采取没收政策，完全摧毁反革命的经济基础”^①。

苏维埃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调节各阶级收入，正确处理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采用剥夺剥削者的办法，一是没收征发豪绅地主的财产，向富农捐款，把主要的财政负担置于剥削者的身上。二是没收和接管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阀仓库中的粮食、布匹、食

^①川陕省苏印：《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1933年7月30日）

盐、烟土、牲口、枪子、现金、机械、钢铁、糖、纸、衣服等常用军需品。根据当时资料显示，1933年下年，巴中县（清江）二区，交省财委的大银子计十四锭；硬银洋三千多元；铜元计装有十四麻袋；花银子（首饰银）两背。受到省财委的表扬，这个区被评为模范区。这些没收而来的各类物资，成为当时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没收缴纳得来的财物，一方面用于政府开支与军队建设，另一方面则用于群众工作。《没收条例说明书》中明确“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没收政策，除了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外，最要紧的是满足贫苦工农群众需要物资的要求，要等这些群众起来为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团结雇农、苦力、贫农，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斗争，肃清封建残余势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2. 税收管理

随着政权的巩固，为解决战争物资供给，实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扩大，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通过较为规范严格的税收管理，促进商贸繁荣，保障军需民用，提高财政收入。

1933年2月，川陕省工农税务总局成立，随后，各市县工农税务分局和乡镇税务所相继建立，税收工作得以有效规范开展。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为发展根据地财政经济，执行中央累进税率，制定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明确提出实施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是我们的阶级税收政策，征收有钱人的税来办穷人的事，不要穷人出一个钱，这和国民党

整穷人的苛捐杂税绝对不同”^①。川陕革命根据地利用累进税调节各阶级财富差距，抑制富人过富，防止穷人过穷，同时利用富人缴纳的税收积累资本，为根据地建设增添经济动能。

《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规定征收以下工商业税种，一是特种税，以白木耳、鸦片烟、屠宰税 3 类当地特产为税种对象。二是营业税，凡经营商业者，每月所得金在 500 以上、700 以下抽 0.5%；700 以上、1000 以下抽 1%；累进至 10000 以上抽 5%。三是入口税，纸烟、香水等非工农必须品，“皆得从值抽百分之五起，以至百分之十为止”；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材，耕牛、小猪等，皆得免税。四是出口税，粮食、布匹、棉花、中西药材，耕牛、小猪、盐等，“皆得从值抽百分之二十起，以至抽百分之五十为止”。必要时，苏维埃政府得禁出境；茶叶、锅、煤炭、鸦片烟等皆得免税。^②

农业税表现为苏维埃公粮。1933 年 8 月 1 日颁布的《公粮条例》明确指出，“政府得依照农民的经济状况，征收农业累进税，这就叫做苏维埃公粮”。农民在规定的数量范围内，按照自觉自愿的原则，上交粮食。公粮规定的数量范围，是“由每个成年、老年、小孩，在每年吃穿尽够，还有剩余的粮食来决定”：成年五背起征，纳粮五升，六背以上纳七升，累进至十背以上纳一斗八。老年小孩四背起征，纳粮五升，五背以上纳七升半，累进至九背以上纳二斗。富农三背起征，纳粮五升，四背以上纳七升半，累进至八背以上纳二斗。^③

苏区对群众交纳的公粮和征收累进税，体现了照顾雇农利益

^①四川省税务局，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②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1933 年 8 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279-280 页。

^③王明前：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78 页。

的原则，即农民的起征点高，而累进率低；富农起征点低，累进率高；对特殊人群实行减免和区别对待，适应了现实需求。

3. 生产与经营

川陕革命根据地处于贫瘠的大巴山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且囿于频繁的战争和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十分困难。仅靠没收、征发、税收等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只是权宜之计，不利于根据地的长远发展，经济建设更需要的是适应现实的生产与经营。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以农业生产为首。通过打土豪，分田地，鼓励农业生产，分发农民农田、农具、种子等农业生产性资料，“农民分得土地应该奖励他提高生产，多种粮食多喂牲畜，来发展苏区经济。应当反对过去认为‘多几条猪多几斗粮食就是富农，就要没收’的错误观念”^①。动员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种植经济作物、兴修水利，破除军阀时期大肆种植鸦片的反动政策，号召鼓励群众“多种瓜菜多点粮食，多喂猪牛鸡鸭排耳棒，准备棉子，发展耕牛合作社，和农具种子牲畜处理处的工作，互换活路”^②，同时号召群众“创兴水利，开办农具、种子、耕牛合作社，解决雇工苦力红军家属的一切耕种的困难”^③。这极大地重塑了农民的生产自信心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农业产量明显提升。

在战时环境下，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业生产呈现出以军事工业为主，兼及民用的特点。根据地曾先后建设了一批军用、民用工厂，其主要内容是满足军事需求。如工业主要集中于修理军械、缝制被服、纺织衣物等。“军用工业中的兵工厂的产品如枪支、弹

^①没收条例说明书（1934年5月7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63—264页。

^②红“五一”工作的检查与五卅运动的决议（1934年5月5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81页。

^③平分土地须知（1934年12月30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522—523页。

药、炮弹、被服等直接对应红四方面军的供应，产品不面向市场流通，因此不能取得财政效益”^①。当时的糖坊、被服厂、斗笠厂、造纸厂、农具厂等民用工业除供应补充军队所需之外，还供应民需，生产民众日常生活用品。

规模较大的、具有全民性质的商业经济组织——经济公社，和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33年11月，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上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群众“发展合作社或经济公社的组织，奖励群众从白区运布匹棉花盐铁等到苏区来卖，苏区群众运白耳鸦片烟等卖至白区”，通过商品交换，有效促进商业流通，实现经济增收。同时强调“加入合作社一定要农民自愿，反对强迫”，以此让农民心甘情愿地加入合作社，促进合作社事业的健康发展。

另有发展对外贸易事业，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指出：苏维埃政府对“南部、赤江的盐井；广元的煤炭，赤江、南江、万源的煤铁；赤北、红江、赤江、巴中、红胜等县的白耳、黑耳、茶叶；万源、城口的茶叶，仪陇、恩阳的棉花；巴中的白蜡，以及全苏区的桐油、猪毛、药材、木料等这些特产，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与此同时，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成立开铁厂、纺织厂、纸厂、挖盐井、铔厂、粉坊、药行等企业，保证从白区购买根据地所需用的粮食、盐巴、布匹等物质，供应苏区工农兵群众的生活需用。

“苏维埃政府对于遵守苏维埃法令的中小商人，均准其商业上的自由，并予以苏维埃法律的保证，服从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参加任何反革命活动的商人老板，可在苏区自由营业，只缴统一

^①刘金，《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论述》[D]，西华师范大学，2016年，第19页。

累进税，不得没收”^①。这些商贸保护政策的推行，逐渐吸引一些外逃的中小商人到苏区经营，停业的小商人也重新恢复营业，城乡商业逐渐恢复起来。

（二）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苏维埃政府为保障革命战争供给、建立根据地新经济基础，保证政府各项开支的经济手段，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财政经费进行的合理分配。根据地财政支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革命战争经费的供给，二是政府各项费用的开支，三是经济建设支出，四是文教卫生及救济事业支出。

1. 革命战争经费的供给

根据地财政的首要任务，是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财政经济政策决议案》中提出，“保证红军给养与需要，动员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地方党和苏维埃，要用尽一切力量，动员一切物资资源，供给红军需要和增进工农利益，来战胜敌人，巩固苏区，扩大苏区红军”。川陕苏区历经解放通南巴、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战事紧、强度大，所需物资多，因此满足红军的军事需要、保障战争的物资供应，是根据地财政的首要任务，也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板块。

由于根据地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物资条件十分困难，红军部队只能实行供给制，供给标准较低。据曾任大河市镇苏维埃主席吴少林讲，“经理部的工作人员，第一年每月发六块钱，还管吃穿。第二年每月发一块钱，吃饭在食堂，不另发菜金，一年发两套单衣，发新缴旧的。”根据地即使尽量缩衣减食，仍由于战事吃紧、战线较长等因素导致财政支出巨大。

^①中共巴中县委党史室编：《巴中现代革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2. 政府各项费用的开支

土地革命时期，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英勇善战，战绩显著，陆续建立了川陕省苏及以下的道苏，县苏、区苏、乡苏、村苏等各级民主政府。在川北陕南土地上“管辖通、南、巴、仪、苍、宣、达、万八个完整县城，又辖广元、阆中、南部、营山、渠县、城口、镇巴县各一大部分，红军还曾一度占领过城口、开县、营山、南部、阆中、广元、宁羌、沔县等八县”^①，其中包括“两个道苏维埃政府、二十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一个特别市、一百六十多个区苏维埃政府、乡一级别的苏维埃政府数以千计，同志人口约六百万人”^②。由此可见，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根据地的政府行政人员数量不断扩大，日常工资性支出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除此以外，还有国营性质的企业、工厂等工人工资，苏区内如交通站、联络处等各项建设产生的费用也是苏维埃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经济建设支出

苏维埃政府通过土地革命，实现旧生产关系的摧毁，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从财力、物力方面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事业。

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苏维埃政府在川北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把没收得来的土地、农具、种子、耕牛等生产性资料分配给农民使用，“并支付了创办水利，开办农具、种籽、耕牛合作社的费用，

^①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第256页。

^②刘金，《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论述》[D]，西华师范大学，2016年，第25-26页。

以及为增加生产力而开展的戒烟运动的费用”^①。重视农业生产的系列措施，满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正如平昌县得胜毛远明所述，“通过土改，农民积极性高，生产硬是好，天雨也合、接连丰收，常说：‘粮不纳、捐不排、红军来了吃饱饭’。有对联：‘工也乐、农也乐、红军来了大家乐’”。

投入交通运输事业，方便根据地部队行动和物资运输。川陕革命根据地处于大巴山区，山峦起伏，道路窄狭崎岖不平，河道阻塞、桥梁破烂不堪，交通异常不便。红军到地，苏维埃政府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便利群众，一是修筑干道，发展陆路交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修建了以巴中为中心的运输干线。**1933年7月至10月**，川陕省党政机关组织动员大批人力、财力，修复一条从通江经巴中到南江的交通干线；**1933年至1934年间**，有修建清江渡到通江的石板大道。二是修桥疏河，兴建水上交通。**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动员木工、石工等民工修建巴河大桥；发动群众疏通巴中到江口、江口至通江苦草坝的水上航道，清理恩阳至后坝、三江**60**多公里的河床。三是修船造船，增加交通工具。开办木船制造业，在南江、江口、通江、巴中设立造船厂，招募、培养木工，建造木船，为红军顺利渡江作战提供交通工具。

此外，经济建设支出还有一部分用于对国营商贸及其对外贸易、金融管理等方面。这些财政支出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促进工农业恢复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4.文教卫生及救济事业支出

^①李树棠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全苏区的二十三个县（市）的乡村学校及苏维埃红军培养干部的各种学校的费用和红军家属入学读书时完全免费，无钱置办书籍、纸笔、墨水等学习工具的由苏维埃帮助解决。学校的各种费用和优待费，是一项比较大的开支。

当时根据地的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如列宁小学；一种是指在培养各种革命干部的学校，如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扬学校等。为了对儿童实施普及教育，川陕省委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的斗争纲领》中提出要在“各县建立列宁学校，各区建立小学或工农教育所”，《团川陕省委工作决议》亦指出，“要普遍农村青年教育，各区乡都要成立列宁小学。”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根据地列宁小学普遍的建立起来。《国闻周报》第 10 卷 46 期中提到，“红军攻占巴中后，在二十八天内各乡村的民众小学已成了二十余所。”

为适应战争和人民的需要，根据地建立了许多医院，比如红四方面军总部设有总医院，各军、各师有分医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地方设有工农医院。总医院规模很大，共有三至四千人，对于治疗红军中的伤病员和宣传卫生常识，改善根据地人民健康状况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为帮助人民群众和红军家属克服困难，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互救”机构，举办了优抚救济事业，开展各种工资活动。苏维埃政府规定：“没收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头目的财产，粮食衣物分给穷人。”对于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组织群众互相救济和政府补助外，中央还颁发了《红军家属优待条例》，

“红军家属有病，可由苏维埃国家医院或工农医院免费治疗（如请医、送药、抬送红军医院等），如遇死亡，由当地苏维埃帮助殓葬，并帮助照料其家属等。红色战士如因战争和工作中伤亡者，由苏维埃实行伤亡抚恤条例，特别优待抚恤。”以上费用均由苏维埃财政支出。

三、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主要特点和成效

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充分了解地区发展现状和经济特点之后，制定的一系列详实、合理、科学的财政政策，有序、稳健地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打通了阻碍地区繁荣的难点、堵点，扭转了根据地成立之初的萧条、破败局面。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为保障战争的胜利、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1. 统一财政建设，集中计划运营

随着革命战争的接续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财政收入方面将税收入入重要途径，没收、征发、生产、商业贸易等也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同时在财政支出方面，不仅革命战争和政府经费的需要相应增加，社会建设方面也是一大笔支出。这就必须实行统一财政，改变过去的自收自支，正确处理各阶层之间的财政收支关系，加强财政管理，规范财政秩序，收好、管好、用好有限的财力、物力，更好地为革命战争与根据地建设服务。

为加强财政工作的计划性，明确支出范围和标准，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与各项工作的开展，川陕省苏维埃《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每月费用有精确的预算决算，各县成立经济审查委员会，批准预算，审查决算”，并强调“各级苏维埃的开支，按

期清算，厉行统一经济”。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县财政委员会，集中各区现金，存放省工农银行，实行统一开支，审查各区帐项；根据省苏财政经济委员会、税务局布告征收统一累进税；规定全县的预算决算、收入和支出，交上级审查。区经济委员：集中各乡经济，实行统一开支，审查各乡帐目，发展合作社的组织，组建经济公社，代收统一累进税。修筑道路桥梁，安设船支。

细如税务工作方面统一税收，《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提出要“实行统一累进税。除各要场上设立分所以外，他处由可靠的群众帮助代收。县分局的巡税员，每十天巡税一次，算帐提钱”。《税务条例》指出，“各场税务分所负责人员，每十日必须将收税款及发出之三连单存根，印花贴消数目表报缴县分局，各分局每到月终汇报省总局转财委会备查”。

这样统一财政，对于克服各自为政和分散财力的问题，保证红军和政府开支的供给，以及统一税收负担，都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2. 严格财政纪律，反对贪污浪费

财政作为国家的命脉，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甚至阶级政权。为保证根据地财政收入的合理使用，励行节省，充裕革命战争经费，必须严格财政纪律，反对贪污浪费。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组织的工作概要说明》规定：“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会计科，管理银钱收支，有多的款子则存入银行，审查各地帐目，规定预算决算，要特别注意节省”。《财政经济决议草案》明确提出，“苏区经济要厉行节省，一切浪费行

为应给予严厉打击。特别是各工厂、农场以及一切生产场、厂要极力提倡节省原料，利用废物，提高工人的革命热情，自觉为节省原料与增加生产举行革命竞赛”^①。省苏布告《没收与征发》中明确苏维埃行政工作人员同样遵守各项规定，“各机关工作人员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钱或物质购换”“反对包藏保护豪绅地主财产的行为”。

根据地开展的反贪污浪费斗争，不仅打击了贪污和浪费的现象，保障经济建设的健康进行，而且涤净了干部群众思想，为建设一支廉洁奉公、风清气正的革命队伍肃清了障碍。

3.重视人才培养，优待专门人才

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和骨干力量。苏维埃政府“从各方面设法收集各种军事专门技术人才，和炮科、工科、无线电、兵工厂、飞机、医务等专门人才”^②，为根据地的建设增添重要人才力量。

苏维埃政府为优待专门人才，在《优待专门人材条例》指出，“愿意在苏区服务之专门家及遵守苏维埃政府法令，不得与反革命勾结或参加其行动，并须忠实其本身工作；各种专门人材在苏区服务之薪金，不受苏维埃薪资条例之限制。每月薪额由六十串至两千串，有特别技能其薪资超过两千串者临时规定之；凡有关于学术上的著述，由国家出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交国家印刷所付印，并斟酌其价值予著述人以相当报酬；关于学术上之新发明，经苏维埃文化机关审查后，从优给以奖励”。据过去弹花厂工作人员郭士科讲，“兵工厂生产子弹的工作，一般的每月工资 18 元，

^①赵洪贤，《川陕苏区的财政政策初探》[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8 页。

^②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 年，第 30 页。

最高的 40 元”，原长池书记口述，“铜元厂的工人发工资，技术好的工资要高些。”这些均体现了按工偿价，多劳多得的原则。

重视人才、优待人才政策极大程度上留住了人才、培养了人才，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越的人力资源。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主要成效

1.有效保障了红军军需物资的供给

根据地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战争所需物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扩建历经多次战斗，物资消耗量巨大，但因为长期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多、自然环境恶劣等各类因素，根据地的经济基础薄弱、物质资源稀少。在如此艰难苛刻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实施如税收管理、发展国营经济等系列财政措施，多途径、多方式集中物质资源、调动人员力量、复苏经济基础。从而整顿财政体系，充裕物资，供应军队，解决前线枪支弹药所需，供应后勤衣食住行所备，有效保障了军队的军需物资。

2.极大促进了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

根据地的系列财政措施，在优先保证红军基本物资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将其他物资分发给穷苦百姓。如《公粮条例》中规定的公粮分配问题“公粮的分配，以十分之四作为苏维埃公物人员及来往运输队吃，以十分之四作为红军吃，以十分之二作为社会保障（即发给没有生产能力的鳏、寡、孤、独、废残者吃）”^①。除此之外，“打土豪，分田地”、实行“统一累进税”、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等各项措施，均满足了农民基本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潜力，盘活用好各项农业、人力、自然资源，种植粮食、架桥铺路、开办工厂等。穷苦百姓的生活条件

^①《川陕革命地历史文献选编》（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4页。

渐渐改善，生活水平提升。

3.有效促进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将经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面对根据地由于长期军阀割据带来的农业生产滞后、工业建设惨淡、货币市场紊乱、百姓生活困苦的整体现状，“苏维埃实行‘经济集中、统一保障’的计划经济，并积极开展货币统一和建设新的金融秩序，探索市场化经济体系建设，将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范围的生产力发展”^①。一系列的没收与征发、税收政策、合作社和经济公社的成立等各项措施，紧抓根据地经济特点与发展需要，动员广大劳苦群众参与经济建设、打击豪绅地主，实现了苏区经济的恢复发展。

^①李胜，《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研究》[J],黑龙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2022年，第3页。

